



郭 杰/著

屈原新论

(增订本)

吉林大学出版社

屈 原 新 论

(增订本)

郭 杰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屈原新论：增订本/郭杰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601-1590-X

I. 屈... II. 郭... III. 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
—人物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7066 号

屈 原 新 论 (增订本) 郭 杰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仲怀民

封面设计：张沫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字数：264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01-1590-X

定价：12.00 元

序

公 木

屈原生于战国后期，“诸侯异政”的局面，行近结束，天下归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异说”的风气，还很活跃，理性主义作为一个总的倾向和思潮已深入人心；而独于荆楚之间，巫风犹盛，原始宗教观念传统还具有活力。这就使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屈原得以把最高的儒家理性精神显象于本能冲动或迷狂信仰的巫术感性形式中，楚骚的冠绝古今，正以其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达到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熔化成了有机整体。这就是为什么屈原不仅仅是表征着时尚兴盛的荆楚巫风的楚国诗人，而更尤其是高扬着已臻成熟的华夏文化的中国诗人。他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鲁迅先生曾就此指出：“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汉文学史纲要》）。这就是说，屈原诗固压案学颂，源自风雅，但未受“诗教”的道德规范，而依其“尚未沦亡”的“固有文化”，生发出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表现得自由而充分。这就使着文论家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不禁叹赏：

“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可以说，这评断是极为精审的。

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通向永难穷尽的精神宇宙，它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是无从窥探其底蕴的美的源泉。言屈骚者，自两汉以迄近世，何止千百家，而光景常新，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都泛放着异彩，自然犹待有心人慧眼自领耳。

郭杰同志，敏于学，有远致，以其青春华年，尽萃于心仪诗宗，在大学本科阶段便研读了诗人的全部作品；继而以《离骚》为题撰写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后又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更把这个课题放在中国文化与美学思想传统中，作了系统全面的探索，从而益发深化了对于楚骚精神内涵的理解。逾十载耙梳发掘，真切地体认到，在意识形态层次上，它既继承了已具统一性的北方礼乐文化传统；而在社会心理层次上，它又汲取了仍有地域性的南国巫教风俗丰采。两者紧相结合，更交织着诗人的被谤见尤，媒绝路阻，烦冤瞀容，怀信侘傺，直至逡巡于生命的边沿，几呼彭咸，终沉渊底。“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此王夫之《楚辞通释》所揭示。而把艺术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死亡的主题。——“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这便触及了刹那真如驻永恒的人性意义。它极大地发扬和补充了儒学的理性精神，而构成中国优良文化中一个重要因素，但又是以诗人个体血肉之躯的现实存在，以及其感知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来寻问真理：“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孰无施而有极兮，孰不实而有获？”踟蹰倘佯在漫漫修远的人生之路，诗人上下求索，满怀激情地来追询，来发问，来倾诉，来诅咒，来执着地探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

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要求凡此一切在死亡面前展现出它们的原形，他要求给炙烤的迷惑以解答：“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而这一切是禁得住正常理性审视的吗？是能够被健康的神经理解的吗？生存失去了支柱，所以《天问》；污浊必须超越，所以《离骚》。从而实现了一颗饱经风霜深受创伤的孤独的心，痛苦、困惑、烦恼、骚乱、愤慨、哀伤，而又那么高洁，那么坚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于是，我们肃然且怵然地看到：一个光耀寰宇的巨大的心灵，充满了极为浓烈的情感哀伤。而这哀伤的情感，是自我在绝望中选择死亡，同时又拳拳眷恋世界和依依回顾生存，从而激发的非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情感。它是诗人的情感。始终萦绕着纠缠于自我参与了的种种政治斗争、危亡形势和进退沉浮。这里丝毫没有庄周式“死生无变于已”（《齐物论》）的超脱，也不尽雷同于孟轲式“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的浩气，而是执着在这些具体事物的状况形势中，来判断是非、真假、善恶、美丑，这些判断不只是理知的思索，更尤其是感情的反应。在这里理知是沉浸融化在情感之中的，而且不是那种所谓“普遍性的情感形式”所能等同或代替的；它是个个性化的、诗人以舍生入死为代价的呼号抒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本身的显露。它是诗人的情感。它是把庄周的超脱与孟轲的浩气内化在诗情的美感之中了。此即所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文心雕龙·辨骚》）。两千年来，可以说，伟大诗人的不朽诗篇，已经深深地融汇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之中，已经牢牢地积淀在全人类的艺术宝库之中，从而获得了永久的生

命。

郭杰同志经兀兀穷年的钻研，得能含英咀华，臻于有成，自是基于个人不懈的努力，亦复受益于导师杨公骥教授的循循善诱。自从 1987 年以来，在其于东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显然大大提高并拓宽了他的思维视野与理论空间，这无疑是在杨公骥教授精深笃实学风影响下达到的。反映在他撰写的这一博士论文里，便耀人瞳目地闪现点点火花。近年来，调任吉大中文系教职，协助我编成《中国诗歌史论丛书》，更使我看到他慎则敏学的操守与精细干练的作风，在治学与做人之道上，尤富现代以至当代意识，灵活度容有超越乃师、青出于蓝之实绩，对于我的偏执疏阔，亦多纠补助益，《史论》编写计划，于搁浅有年，终得完成者，实多得力焉。在这期间，郭杰同志更以自己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增补修订而成为《屈原新论》书稿。书中大半章节，曾作为专题论文，分别在国内各地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蒙转载、选摘，已脍炙人口，时闻啧赏。今书稿将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行见学林即绽新葩，我愿预为祝贺。伟大诗人以及其不朽诗篇，当然是永远激动人心地被誉为传诵着，其人其书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天空中是永放光芒的恒星。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人类精神世界却不得由精神产品的意蕴与原意直接构建，而必须是肇始于创造，形成于理解。对意蕴与原意的理解，不可能仅仅根源于作品与历史本身，而必须结晶着一代一代人和一地一地人的生活体验、思想、意志、感情以至“先见”与“前识”，甚而制约于时代意识与民族特质。这就决定了如西谚所云：“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当然诗人屈原也定将是广及世界人类，又首先是泽被中华民族的。而其光辉得以超越时空，岂不还是有赖一代代和一地地学人的传述、图录、笺注、说解和阐释吗？也只有经由

这些途径，诗人及其诗篇才得腾跃于精神世界的天空。这个精神世界原本是肇始于创造，形成于理解的啊！在这个意义上说，《屈原新论》自然也便是“新屈原论”。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屈原，体认容有偏正，解释容有浅深，论说容有宏细，而作为理解，总是在拓展诗人映照的光圈。诗人，即使是伟大的诗人如屈原，也是有赖于一代代一地地后学的理解才得不朽的。。不是吗？《屈原新论》无疑将会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天空投添一道光采，自然是伟大诗人屈原的光采，而折射出这道光采的则是具备现代型态的三棱镜啊！

郭杰同志把书稿抱给我看，嘱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于此，首先我自当由衷祝贺，不觉也分得几份高兴；然后还想补充说：科学无终结，因为真理无终结。“科学即历史，科学真理则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岂不闻爱因斯坦如是云？未及不惑，未日方长，高峰在前，犹待攀登。然乎否耶？是为序。

1993年10月3日长春

目 录

序（公木）	(1)
导论	(1)
一、屈原的文化传承	(1)
二、屈原的时代环境	(9)
三、屈原的生平遭际	(16)
四、屈原的作品归属	(23)

上 篇

第一章 先秦政治思想与屈原的社会理想	(33)
一、先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33)
二、屈原社会理想的儒家色彩	(38)
三、屈原社会理想与法家对立	(43)
四、内在矛盾与悲剧结局	(47)
第二章 先秦道德观念与屈原的人格情操	(51)
一、先秦道德观念的演进轨迹	(51)
二、屈原的道德理想和善恶标准	(54)
三、在内心冲突中熔铸峻洁人格	(59)
四、历史意义和道德价值	(63)
第三章 先秦国家观念和屈原的宗国意识	(66)
一、从先秦国家观念看楚的性质	(66)

二、屈原宁死不肯去楚原因探讨	(72)
三、简短的结论	(78)
第四章 先秦神话诗歌与屈原的艺术想象	(80)
一、从神话想象到艺术想象	(80)
二、从《诗经》的“比兴”到屈原的“象征”	(86)
三、屈原艺术想象的主观条件	(91)
第五章 先秦美学思想与屈原的诗学观点	(94)
一、理论基础：美善统一	(95)
二、思想核心：发愤抒情	(98)
三、艺术实践：个性鲜明	(102)
四、历史影响：深邃久远	(107)

下 篇

第六章 神性与人性的交融

——论《离骚》的自我形象	(117)
一、主要的历史渊源	(117)
二、自我形象的神性因素	(121)
三、自我形象的人性因素	(126)

第七章 理性、情感、想象

——论《离骚》的审美价值	(132)
一、坚实的理性基础	(132)
二、丰富的情感内涵	(137)
三、奇幻的想象特征	(144)

第八章 民间祭歌的艺术升华

——论《九歌》的音乐特性	(151)
一、问题的提出	(151)

二、“兮”字在先秦诗歌中的一般用法	(153)	
三、从《九歌》性质看其音乐特性	(156)	
四、从音乐特性看《九歌》“兮”字用法	(162)	
五、几点结论	(167)	
[附记] 读《九歌》札记 (四篇)	(170)	
第九章 巫俗艺术的奇葩		
——论《招魂》的艺术特征	(184)	
一、《招魂》作者补证	(184)	
二、《招魂》艺术初探	(188)	
第十章 悲剧人生的艺术映现		
——论《九章》的精神内涵	(199)	
一、题旨与时序	(199)	
二、少年壮志	(201)	
三、不平之鸣	(207)	
第十一章 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论屈原的文体贡献	(216)	
一、语句宛长，辞藻丰富	(217)	
二、篇幅宏大，结构完整	(220)	
三、善用问答，抒写别致	(223)	
附录一 从《生民》到《离骚》		
——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	(229)	
附录二 海外楚辞著作提要 (七篇)		(261)
附录三 关于本书初版评论 (五篇)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30)	
后记	(337)	
增订本跋	(340)	

导 论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本书将对屈原的思想精神和艺术创作进行专题研究。全书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从社会理想、人格情操、宗国意识、审美观念等方面，论述屈原的思想精神；下篇通过对《离骚》、《九歌》、《招魂》、《九章》等作品的具体分析，阐发屈原的艺术创作。这里，首先就屈原的文化传承、时代环境、生平遭际，作品归属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作为全书开展研究的基础。

一、屈原的文化传承

在世界各地，最古老的人类文明总是与诗歌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古希腊有《伊利亚特》、《奥德赛》两大史诗，古印度有《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大史诗，古中国则有《诗经》、《楚辞》两部伟大的诗歌作品总集。它们不仅开创本国以至周边地区古老而悠久的文学传统，并且对人类整体文化的历史发展，也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然而，往事如烟，那些留下如此辉煌诗篇的诗人们，其生平情况大多渺茫难寻了。《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相传是盲诗人荷马；《罗摩衍那》的作者，相传是蚁垤仙人。但这毕竟只是传说而已，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现在已经无法知

晓。与此相比较，不能不令人感到庆幸的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屈原，其生平和思想的基本情况，仰仗我们民族史学传统的深邃无际和绵延不息，迄今仍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最可靠的材料，是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的诗歌（辞赋）作品，则保存在汉代王逸所编集的《楚辞章句》中。屈原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位伟大诗人，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知道，研究诗人（尤其是伟大诗人）与时代的文化氛围、历史的文化传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诗人自身的创作和思想，而且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脉络。因为任何诗人的艺术创作，都不是孤立的现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指出：“艺术是和整个时代与整个民族的一般世界观和宗教旨趣联系在一起的。”^①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也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② 显然，离开时代的文化氛围和历史的文化传统，就无法对诗人的思想意识、艺术表现和审美观点的形成，作出真正科学的解释。另一方面，诗人接受文化的时代氛围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并非只是被动吸收和消极反映，而是在主体心理结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积极能动的同化过程。因此，以诗人的天才和个性为决定因素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其意义自然就不限于作品本身，而必然对母体文化起到推动和创新的重要作用，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绚丽生动。

像屈原这样一位伟大诗人的出现，当然是与特定的丰厚文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8页。

②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化土壤密切相联的。对此，古代学者多有论述。最早精辟而系统的研究，来自汉代学者王逸。他在《楚辞章句·序》中指出：“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他又在《九歌序》中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抑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撇开其某种附会经学的色彩不言，单纯从研究方法来看，王逸至少昭示出两条主要途径：一是着眼于屈原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北方中原文化的关系；二是着眼于屈原与巫教风俗为标志的南方荆楚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具见识的。后世学者基本上循着这两条途径展开研究，并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当然，比较而言，在古代，由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学者们更侧重于前一途径；而在现代，随着考古学、民俗学的兴起，学者们更侧重于后一途径。但是，如何在这两条途径之间寻找其内在的统一性，进而说明不同文化渊源分别在何种程度上为屈原的诗歌创作所吸收和融汇，则依然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已有学者指出，春秋战国时代，在华夏民族活动的范围内，同时存在着四个文化区域，即荆楚文化、邹鲁文化、三晋

文化和燕齐文化。^① 这四种文化，类型各异，特点不同，其中尤以南方的荆楚文化，与北方的后三者之间，差别更为明显。如果不对当时中国文化的这种区域性特征，作出趋于绝对化的理解，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上述文化类型的划分。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云：“屈（原）宋（玉）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无疑地，屈原等人创作的辞赋作品，正是在荆楚文化辽阔土壤中耸立起来的一座艺术高峰。从荆楚文化的特殊性着手来研究屈原者，代不乏人；及至晚近，更是蔚然成风。这本是一条正确的研究途径。但问题在于，屈原作品是否纯粹由荆楚文化所派生呢？对此，时下学术界大有肯定之势，而我们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对“文化”的一般看法。任何精神文化，都是由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两层次构成的。前者又可称为精英文化，乃是以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成熟而集中地展示人们的思想观念，因为多为社会上层所把握，便于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推广传布；而后者又可称为大众文化，它以零散自在的方式流传于民间，反映为社会各阶层共通的情感、愿望、习俗、风尚等等，因而具有地域性、部族性、传统性等特征，不易随外部因素之影响而改变。在中国，自商代以来，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即是在意识形态层次上的逐渐统一；周代更以宗法等级的一系列秩序和观念，维系了以王畿为核心的广阔地区的统一。到了屈原生活的战国时代，南方荆楚与北方中原在意识形态层次上，已无明显差异，而达于基本一致了。当时南北文化之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心理层次上，即北方更重实际而

^①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25 页。

少玄想，南方则更富于巫教浪漫色彩。

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社会心理的地域性，构成了中国上古文化的丰富多彩的风貌和一脉相承的特质。对此，李学勤先生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商周王朝的统治区域是很辽阔的，在王畿外有诸侯，其周围还附属的大小方国。中原文化经常与周围地区的文化交流融汇，彼此互相影响、互相沟通。所以，古代文化的统一性和地域性，是文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统一性和地域性是一对矛盾。我国的古代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广大领土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人民，其文化处于不停顿的交融过程之中，所以既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又有广泛的统一基础。”^①

就屈原作品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在意识形态层次上，其思想与集北方传统思想之大成的儒家学说是基本一致的。例如屈原热烈赞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的社会理想，这与孔子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何其相似；屈原坚定表白“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的人格理想，这与孔子所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亦复相同；屈原积极倡导“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的美学思想，也与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在战国时代，虽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尚待逐步修复，而作为社会活动之先导的意识形态，却早已基本统一了。这在屈原作品得到明显的体现。

但在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的层次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屈原作品中确实具有迥异于北方文化的荆楚特征，即充满巫教

^① 《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7页。

神话的浪漫色彩。如《离骚》中上叩天门、下求美女的神游，饰兰佩蕙、被香戴芳的装束；《招魂》中上下四方的凶险怪异；《九歌》中天神地祇的轻歌曼舞等等，皆与“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子产语），“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的北方文化，是扞格不入的。所有这些，乃是作为民间的社会心理长久流传下来，且不易因外来文化的交流冲击而迅速改变。屈原的作品，正是在弥漫于荆楚民间的巫教神话影响下，加以吸收融汇、创造发展，所以才如此地情文并茂、炉火纯青，把中国诗歌推上一座辉煌的艺术峰巅。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全面总结和辨析了汉代学者对屈原的评价，并以儒家诗学为准则而提出己见，揭示了屈原作品中兼具“同于风雅者”和“异乎经典者”的双重文化特征。王国维先生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亦从南北文化传统之差异入手，通过对其作品之情感、想象等基本要素的细致分析，而提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的结论。这两篇经典性的论文，分别代表着古代和近代学者关于屈原作品之文化精神的最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今天看来，其个别观点或不可商之处，但总体上，其科学的态度、精辟的见解和辩证的方法，仍然颇具启发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他们虽然未能对中国上古文化作不同层次的划分，但其关于屈原作品内容与南北文化异同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昭示我们：只有从文化的地域性（在社会心理的层次上）和统一性（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相结合的角度，方能真正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屈原。而如时下一些学者那样，单纯从荆楚文化之地域特殊性的角度立论，实不足以很好地说明屈原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征。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卓越贡献，不仅在于他通过优美的诗歌作